

资政参考 敬请阅览

视点

第 16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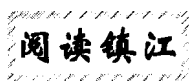
镇江市图书馆主办

2012年10月15日

ZHEN JIANG LIBRARY

本期 导读

- ☆ 大国外交需要“软硬兼施”
- ☆ 从“幸福感言”中读出的内容值得深思
- ☆ 应少些对诺贝尔奖的“伪关注”
- ☆ “管群众”应转为“群众管”
- ☆ 输得起才有正常社会
- ☆ 湖南：看住“一把手”
- ☆ 镇江“网络问政”火辣开问
- ☆ 中国公民“政策参与”亟待提升



镇江名人（九十八）

革命志士——边学文(1920—1947)，又名义堂，回族，祖籍安徽寿县。幼时家贫难以生活，其父母挑了担箩筐，至上党乡王甲村落户。几年后迁至唐甲村定居，以贩盐为生。

边学文读小学时，聪明过人，成绩优秀。民国 28 年(1939)，他参加了镇、句、金、丹四县人民抗敌自卫委员会的革命活动。同年秋，边学文回乡动员青年参加新四军，并表示不打败日本鬼子决不回家。入伍后任十八旅五十三团团部勤务员、特务员。不久，边学文要求下连队锻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民国 30 年（1941）4 月至十八旅副职干部短训班学习。边学文学习刻苦，勤于钻研，结业考试成绩名列第一。后调至五十二团一营任三连任副指导员、指导员，从此转战苏中平原。边学文历经数十次大小战斗：曾在十三庄带领一个排，掩护团部撤退；后奉命带一个排至淮安开辟地方工作，大刀阔斧，打开曹南区的新局面，敌人对他恨之入骨，多次派特务谋害，但均未能得逞。边学文归队后，当时连队生活艰苦，环境险恶，由于重视思想工作，其所领导的连队，13 个月没有一个逃兵，受到上级通令嘉奖。

《苏中报》专门对边学文进行了表扬：朱开战斗，边学文身先士卒；真庙战斗，他一人缴获十几支枪；三垛战斗，边学文身负数伤，连队伤亡也很重大，但边学文仍坚持带头作战，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边学文伤愈归队后，任营副教导员，率部“首战周家庄”、“血战兴化城”、夺取“如皋大捷”等。民国 35 年（1946），国民党顽固派撕毁停战协定，进攻解放区，时任营教导员的边学文，参加了宿北战役和峰县战役，消灭了国民党的快速纵队。

民国 36 年 1 月，边学文在枣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现出了年仅 27 岁的年青生命。

供稿：镇江市图书馆文献开发部

镇江“网络问政”火辣开问

运河路与健康路交叉口“黄灯”设置是否合理？镇江几大医患纠纷市卫生局有无调查？继镇江市首届网络问政成功举办后，9月27日下午，第二届镇江网络问政活动“麻辣发问”。4条为当地市民极其关心的问题一一提出，镇江市卫生局、园林局、住建局等八个职能部门的网络发言人与近百名网友面对面，零距离答疑解惑，同时十名长三角网络代表对解答评分，网友现场火辣追问，一条问政解民忧的道路再次开启。

活动刚开始就有网友首先抛出“运河路与健康路交叉口信号灯黄闪设置是否妥当”的问题，镇江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由于此路口的特殊原因，信号灯“黄闪”放行右转车辆属于常规行为。而由此所造成的非机动车与绿灯放行车辆抢道是由于某些行人或机动车驾驶员不文明行驶所造成的。

随后，网友紧跟着提出了交通局是否可以处罚违规驾驶员的追问，该负责人则肯定地回答道：“对于违反交通法则的人员，无论是机动车驾驶员还是走路的行人，交通部门都会按照相应的法规进行处罚，还市民一个正常有序的行路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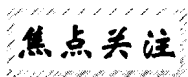
近年来，镇江市医患纠纷事件频繁发生，还有不少在网上被爆出。对此，有网友直接把矛头指向了卫生局，质疑他们是否介入了调查。“卫生局一直对医患纠纷很重视，力争第一时间对纠纷进行处理。”镇江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解释说，“经过我们的调查，5起重大纠纷中有3起是缺乏相互沟通而导致的。解释后，病人家属与医院双方也都相互谅解了。有违规现象的人员，我们也进行了相应责罚。”“卫生局是职能部门，是应为老百姓说话的，但同时卫生局也是医院的主管部门，你们会不会替医院说好话？”现场有市民追问道。这个问题着实让该负责人紧张了起来。“作为职能部门与主管部门，我们一定会协调好两个角色，但无论是何种问题，只要是关系到老百姓民生的，我们都会首先为老百姓着想，保障他们的切身利益。主管医院，就是要让医院为老百姓服务。”该负责人坦言。

一个小时内，网友还对“南山风景区磨笋山山顶台阶年久失修，相关部门有否关注”“镇江市内居民小区是否全面实现物业管理”等提出了质疑。镇江市园林部门、住建部门等负责人都一一进行了明确答复，网友也对答案表示了满意。

本次网络问政是金山网十周年庆的一次重要活动，得到了镇江市相关职能部门的认可。不少部门代表都表示，虽然有时会被现场的问题问得“直冒冷汗”，但这样的活动必须坚持下去，为

老百姓解决更多问题，为老百姓的事一管到底。

——摘自《江苏网》



大国外交需要“软硬兼施”

2009年以来，中国周边地区的挑战也有所发展，中国的周边形势变得颇为严峻。目前存在一种“机会窗口”的观点。某些周边国家认为，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中国迟早会取得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对于某些自认与中国有矛盾的国家来说，从长期看，时间的发展对他们的谈判地位是不利的。但从中短期来说，中国在真正崛起以前有一个相对脆弱的时期，这个脆弱期可能为5到10年。在“相对脆弱期”对中国发难，可能是最好的时机，错过这个时机，则不利于“维护”其利益。这样一种认识，也会导致中国周边的一些问题在这个时期较为集中地爆发。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越猛，甚至这种情况会变得越严重。同时，美国刚刚宣布重返亚太不久，这也是一个时机。在美国对重返亚太依然处于高调的时期，那些站在美国一边的国家，即使其行为有些出格，美国也不好公开表示对其行为不支持。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前也是这些国家考验美国的时机，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国家会对这样的时机加以利用。

此外，对我们来说，特别值得思考的是，对于中国周边存在的问题，如果中国采取不同的政策方式加以应对，对周边挑战的性质、频率、规模的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周边挑战是在中国与周边国家政策互动的过程中变化、发展的，中国不同的政策选择，对这一互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颇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于，中国采取温和的手段不断地甚至更大程度地继续向外部世界释放善意，是否足以应对周边的挑战，是否能够减少周边的麻烦？从历史经验以及国际政治的现实来看，对此的回答很可能是否定的。

大国对外执行高度克制的、温和的外交政策，往往有一个效果越变越差的过程。导致其效果变差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长期对和平意愿的广泛深入有效的宣示，会使大国战略威慑力逐渐降低；二是当周边国家认识到“大国的和平意愿是真实的”之后，他们认为大国有很强的不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倾向，这时，可能会产生通过机会主义行为获取利益的动机。其在行为上的表现，

是对大国的骚扰或利益蚕食变得更加频繁。如果大国对这些侵扰和利益蚕食行为不作出明确回应，如果这些行为没有受到应有惩罚，这些行为就可能逐步升级、加剧，甚至达到明目张胆的程度。

如果一个大国简单地放弃温和的外交政策，转而从总体上执行强硬的外交政策，也会带来另方面的弊端。强硬政策的主要弊端在于，它会使安全领域的竞争激化，产生一些并不希望发生的冲突，或使一些次要的冲突升级，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对外无差别地执行强硬政策，会把一些国家不必要地推到自身的对立面，在自身力量不足的时候，造成战略上的孤立。

从根本上说，这涉及的是外交中软硬两手如何合理配置的问题。从政策层面来说，过度强硬和过度温和都不可取，而且，政策仅仅是长期无弹性地偏于强硬或偏于温和都会产生一定问题。从长期来说，我们的外交政策应该是刚柔相济，不同的手段相互配合。其中，坚定的政策更适于维护自身已有的利益，温和的政策更适于拓展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合作空间。在这方面，我们需要通过一段时期连续一致的政策操作，让外界对中国外交的行为模式形成较为清晰的预期，从而在长期内对其他国家的政策产生引导作用。

——摘自《人民论坛》

从“幸福感言”中读出的内容值得深思

国庆中秋双节长假期间，中国中央电视台在“走基层·百姓心声”的调查项目中，让记者拿着话筒到处问人：“您幸福吗”、“幸福是什么”？问题很简单，答案却不好答。这个试图反映民生的单元，首日推出就遭遇街访的尴尬。

从画面上看到，一位村务工人员看到话筒靠近就推脱一番说，“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问我”。记者死缠烂打追问：“您幸福吗？”。村务工人员瞄了一下记者，面无表情地说：“我姓曾。”这段看似牛头不对马嘴的对话在网上引起热议，被网友们封为 2012 又一“神一样的回复”，有的甚至认为大叔是刻意要揶揄央视记者。

“您幸福吗”在网上恶评如潮，但笔者觉得这个项目挺有意思的，甚至比领导谈话或广大群众干部拥护谁谁谁的舆论宣传更有意义，至少部分民众的声音还是听到了。有什么比人民较接近真实的声音更重要？

在旅游景点被截访的阿姨说：“和孩子在一起就幸福”，这是很典型的中国妈妈的想法。一个腼腆男生不断好奇地问：“这什么活动啊？”，他可能以为这是一场猜中有奖的黄金周游戏。当央

视记者换个方式问：最遗憾的是什么？有位男士给了个爱国答案，“最遗憾就是，现在还没有成功地收回钓鱼岛”。他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连一起，把国家的尊严当成自身的幸福了。

看似轻松娱乐的采访，让人读出不少内容。当然最经典的还数“曾幸福”大叔的黑色幽默，还有他那句悲凉的表白：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问我。外地的、打工的，就注定是卑微的、没有学识的，所以就没有说话的权利吗？大叔是否幸福，从他的第一时间的回应里，已经听出了答案。社会较底层的人一看到话筒逼近、听到“您幸福吗”时，有的直笑不停，有的不知所措。他们似乎从没想过，这辈子会有国家媒体要采访他，有媒体会在意他此时此刻是否幸福。

关于幸福感的话题近年来愈炒愈多，什么“幸福城市”、“幸福指数”等等，2010年中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更提出“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但幸福其实是个比较性的抽象概念，也是很个人的感受，你可以纵向比较自己的现在和过去，也可以横向拿自己和别人比较，其中的落差就会形成“幸福感”或“不幸福感”。

可见，幸福感是金钱物质所买不到的，它是比较出来的、是内心自足释怀的深沉感受。政府不可能给每个人都制造幸福感，但应确保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能同步进行，给民众提供一个相对公平、自由、干净的社会运作空间，减少人们受外部环境所引发的“不幸福”感。

知名社会学者于建嵘说得很深刻：“最近流行‘幸福’，甚至国家电视台都要到大街上去问‘你幸福吗’这样莫名其妙的问题。这是因为有人想把‘幸福中国’作为新的执政口号。实际上许多地方早在叫什么‘幸福xx’的口号了。我曾多次说过，从‘和谐中国’到‘幸福中国’只能表明执政者政治理念的缺失。公平、正义、民主、法治才是治国的真经。”

——摘自香港《东方日报》

应少些对诺贝尔奖的“伪关注”

每年从10月8日开始，瑞典都陆续颁布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和平等5个奖项的诺贝尔奖。今年，因为中国作家莫言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最大热门之一的传闻出来以后，中国大陆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也陡然提升。可以这样讲，自从奥运会、世博会在中国大陆北京、上海分别举办之后，诺贝尔奖已经成为中国大陆梦寐以求的另一世界成就的峰巅。而一种对诺贝尔奖的“伪关注”也凸现出来。

曾经听到这样一个段子。一个人告诉他的朋友，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朋友一听是

中国人的名字，大喜。那个人紧接着告诉他，杨振宁是美国籍。朋友脸色即变，唏嘘不已。而这个例子也实实在在地反映出许多中国人对于诺贝尔奖的真实心态——是为了内心自豪一把，而不是为那份科学成就骄傲。这实际上是一种“伪关注”。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诺贝尔奖承载着更多的是一份“变形”了的民族自豪感。进而言之，对于这样沉重的一个奖项，更多的人关心的焦点是：是否有中国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不是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到底为社会，为人类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一个国家，有人能获得诺贝尔奖，说明获奖者对人类社会做出了较大贡献，对国家的进步也有所帮助。但是，只有每一个人都生活得有尊严，都能提高自身素质，对自己的工作、事业精益求精时，社会才能进步。而社会的进步实在比是否有本国的人获得诺贝尔奖更加重要。

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懂得真正关心社会是否进步，不踏实地为社会做贡献，而只去关注是否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这个奖名，其实也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浮躁的表现。现阶段的中国，还是应该脚踏实地把事情踏踏实实做好，而非追求空虚的名号。一座大厦的根基没有夯实，建得越高也就越危险。同样，中国大陆的各个方面都还需要人们努力地去打好基础，一步一个脚印，否则，不论中国如何渴望得到诺贝尔奖，也终将希望落空。

其实，中国的“伪关注”心态，只是通过诺贝尔奖这面镜子折射出一角而已。中国大陆对“奥运金牌”热衷，却没有多少人致力于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对 GDP 竭力追求，人均收入水平却仍旧缓速上升；各地争先建“第一高楼”，却还是有桥梁“侧滑”，高楼平地“塌”。对各种虚妄的名号进行一味的“伪关注”，而不踏实打好社会这座大厦的基础，总有一天，是要被打回原形的。

时下的中国，应该把心态放平，少一些对诺贝尔奖的“伪关注”。中国更应该关注自身的科学技术是否真正进步，生活水平是否真正改善，和平环境是否真正到来，医疗条件是否真正发达，文化教育是否真正普及，经济发展是否真正繁荣。当这些成为中国关注的焦点和努力奋斗的目标时，当中国人都将自己岗位上的事情做到最好，可以相信，中国人创造的成就，会让“诺贝尔奖”自动找上门来的。

——摘自香港《星岛日报》

“管群众”应转为“群众管”

《中国经济周刊》9月25日刊登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的文章称，由于收入差距的拉大和严重的腐败现象，导致社会上怪象百出，社会的稳定和谐受到了冲击，“安居乐业”受到了挑战。

特别是“民仇官”、“贫仇富”、“弱忌强”和“官压民”、“富欺贫”、“强凌弱”等各种行为及心理，导致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和社会乱象百出。有群众议论说社会上有“二十多”：交通事故多、诈骗绑架多、偷盗抢劫多、拐卖妇女儿童多、工伤与职业病多、卖淫嫖娼多、赌博行为多、行贿腐败多、买官卖官多、制假售假多、食品安全问题多、住房困难多、残疾人群众多、讨钱要饭多、留守儿童多、孤寡老人多、“四二一”家庭多、无业可就多、低收入人群多、群体事件多。

这“二十多”既是以往社会管理有不当之处造成的，也是当下和今后的社会管理必须解决的。不认真搞好社会管理，“二十多”现象就得不到遏制。创新社会管理必须重视“水治”（善治），力争减少“刀制”（恶制），“刀制”手段过多，会造成矛盾的深化、积累，会使事物走向反面。因此，今天的社会管理必须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立足幸福百姓，化解社会矛盾”。一要做好均衡发展，推进“共同富裕”；二要真正做好反腐倡廉，重视在发展中维护人民的利益；三要促进社会管理部门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此外就是要使社会管理由管群众向群众管进行转变。一定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摘自《中国经济周刊》

输得起才有正常社会

《中国周刊》第九期刊登朱学东的文章说，暑假之后，我的孩子要升小学四年级了。周围的朋友早已不断地向我们灌输小升初的经验教训。

北京的小升初是个不亚于滑铁卢的大战役。我们不得不为孩子上什么样的中学开始纠结了。我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父亲从没有过这样的纠结。

“没什么，好好考就行，大不了回家跟我种田打鱼。”父亲当年送我参加高考时，恬淡平静地鼓励我，如平常一样。

从我父亲的平常心，到我开始纠结在孩子输不起的功利心，这是一个家庭心态和价值观的蜕变，也是这个社会及其价值观蜕变的一个侧影。

这种变化，往好了说，不妨看作是有梦想有追求。但另一面，没有了平常心，输不起，是正常社会的一剂毒药，最终可能带来思想行为的扭曲，直至整个社会生活发生变异扭曲。相较我父亲的时代，如今的社会开放度和物质精神财富远较彼时不知丰富繁荣了多少倍，但却处处让人感受到了压抑和紧张。无论小升初的输不起，还是竞技体育场上的输不起，乃至其他诸多领域中的不能输，这都是价值观和社会现实挤压所致。

其实我们曾经有过输得起的时代。

盛唐气象已经太过遥远。从 1980 年代改革的理想主义时代，中国挣脱旧体制的桎梏，从封闭走向开放，到处充满着粗鄙却又旺盛的生命力。那个时候，即期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还没有主宰这个社会，考不上大学，回家务农或到乡镇企业打工也很正常。延续到 90 年代，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我那些回乡的同学，大多数成了当地社会的中坚力量，就是在这一次的社会转型开放中实现的。这是当代中国第一次真正可以“从头再来”“野蛮生长”的时代。

1990 年代后期，中国开始融入世界潮流，在技术进步和美元资本的支持下，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传播产业在中国实现了飞速发展，在传统政商力量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它们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产业，并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失败了重头再来在这个领域更是稀松平常。开放性和自由选择是这一次伟大变革成功的基础。

退一步海阔天空，也必得有大海和天空可退。历史告诉我们，一个输得起的社会，一定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只有在开放社会中，资源才能实现自由流动，才有自由选择的空间和机会，实现其内在价值。哪怕遭遇失败，还可以选择重头再来。输掉一场战役，不至于输掉全部，更不等于输掉人生和尊严。

某种意义上，输得起其实也是个体和社会的试错过程。一个允许试错的社会才能葆有活力，不断向上，也才可能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

依靠行政力量和垄断地位积聚控制资源，最终势必导致社会重蹈封闭旧辙，其他机体失去活力，社会失去提供选择机会的能力。大树底下寸草不生，结果必定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最终输不起的，不仅仅是个体，输掉的还有整个社会的未来。

只有在开放社会中，才能养育社会大众的平常心，最终切掉这些年如蛆附骨的即期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走向常态的社会。

——摘自《中国周刊》

成熟社会不该缺少草根传奇字号

《山东商报》9月25日刊登张培元的文章说，“我先在纺织厂当了三年学徒，三班倒，出师以后才上了大学。现在的年轻人要转变就业观念，到企业、到基层锻炼几年，非常有必要。”9月21日，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于伟国专题调研“就业难”，并用上述的“学徒”经历，勉励大学生积极下基层、进企业。（9月24日《海峡导报》）面对初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已是副省级干部的于伟国勇敢带着感情晾晒学徒经历，回味和品评三年学徒生涯在自己成长经历中的重要性，让人深感亲切、家常。而他阐释的“毕业生先到企业、基层工作几年，不会影响前程，反而能够更加了解社会，了解人生，对人生发展非常有益”之观点，更是令人振聋发聩。

在于伟国们这一代人，工厂学徒、农村务农成为很多人事业和人生的原点，而通过大学改变命运、由基层岗位历练成长，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成功公式。如果翻看50岁以上领导干部的履历表，包括现任厅级省级官员乃至国家领导人在内的无数干部，都有工厂学徒、知青下乡、在农村广阔天地辛勤耕耘的平凡经历。如今回头看来，正是当时草根上升渠道的开放和畅通，才使得众多精英抓住时代机遇，凭借过硬能力走上了社会前台。

无论在哪个时代，青年才俊都需要深入了解基层、全面了解社会。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28亿贫困人口、城乡经济落差巨大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担当公务员，更需要深谙“穷人经济学”。因此，打造人才在基层扎根、人才通过基层熔炉脱颖而出的格局，才是一种社会的常态。

令人感到遗憾和不安的是，近年来，由“学徒工成长为高级领导干部”的故事逐渐成为遥远的传奇。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不愿下基层、进企业，公务员招考中上级机关和乡镇机关冷热反差过大，年年都会引起围观。优质资源上抽，优厚待遇上留，基层权利塌陷，基层收入过低，基层状态恶化，种种基层困惑加剧了基层人才外逃。

公众既要面对解不开的基层困惑，更要面对打不烂的“阶层固化”。在拼爹拼娘、拼富拼钱、拼关系拼家庭的畸形比拼氛围中，在某些地方和行业愈演愈烈的“萝卜招聘”“萝卜提拔”及就业世袭化、权力代际传递、特权就业的挤压下，农民工、城市工薪族等草根阶层就业渠道、成长渠道和上升通道愈益窄化，他们被压在基层甚至是底层难以抽身。在这个基层的围城中，我们再也听不到学徒工转型读研当上干部的新闻，再也领略不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草根传奇。

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人才不问出身、选拔唯才是举，既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环境，更有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机制。但愿，于伟国等领导晾晒“学徒经历”，能够晒出足够的温度和热度，以

进一步融化阶层固化之坚冰，消融基层困惑，让社会上的每个人在人生事业起跑线上都能拥有公平公正的起点。

——摘自《山东商报》



湖南：看住“一把手”

2006年前后，湖南郴州系列腐败案爆发，包括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市长周政坤、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市委组织部长刘清江、宣传部长樊甲生等多名“一把手”在内的一批重要领导干部相继被查处。这些“一把手”之外，涉及此案的150多人中，县市区委书记、市直单位的“一把手”占相当数量。

湖南省纪委党风室负责该项工作的处长刘孙科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2007年年初，湖南省纪委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以后，把对省内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力图通过多种途径，寻找解决良方。”

在湖南省纪委高层谋划党政主要领导监督之时，邵阳市纪委已率先在全市范围内推行党政一把手的监督。

时任邵阳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张亦贤直接推动了这场改革。“从全省全市的情况来看，犯错误的干部，大多数都是担任各个单位拥有绝对权力的大小的一把手。”张亦贤说，“当时大家有共识，无论是理论界还是纪检系统内部都认为，反腐败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对一把手的监督上，一把手相对有比较大的权力，从制度层面对一把手进行监督还没有找到很好的途径。”

不过，要真的监督“一把手”，张亦贤坦承，“我们当时压力很大，也冒了一点风险。说实在话，更多人从心里还是喜欢摸顺毛的。很多县委书记对我讲，第一次把他们列为述廉评议对象并不舒服。可以听出很多人还是有抵触情绪。”

已担任邵阳市委副书记的张亦贤表示，“尽管我们是纪委会常委，换届同样要面临投票，得罪人多了也不行。也有其他的顾忌，我们现在监督的县委书记，说不定哪天升任市委常委来领导这项工作。”

“有一次，我问一位当市长的朋友，像他这样手握权力的人要搞腐败是否容易？他说太容易了，

如果我想要 10 万元钱，几分钟就有人送到手上。可见，目前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面临的腐败风险是巨大的，腐败与否，有时全在一念之中。”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张亦贤这样推心置腹地讲改革的出发点。

最终，《邵阳市关于加强对县处级正职领导干部监督管理的暂行办法》被制定出来。

张亦贤说，具体内容包括“三个‘一’”“两个‘两’”。一是以坚持重大问题集体研究、集体决策，不搞“一把手”个人说了算；二是研究工作、决定事项“一把手”实行末位表态，不搞先入为主，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和市级党政部门负责人每届任期内到市纪委述廉一次，接受纪委集体评议。

两个“两”中的“两不分管”，即“一把手”不直接分管干部人事工作和财务工作。“用人”和“用钱”正是过去领导干部腐败的常见领域。

但真正让官员受到触动的还不止这些，而是“一把手”向纪委公开述廉的环节。

“都是平时很有权威的‘一把手’，突然要公开在纪委剖析自己，质询环节随时要回答提问，更为关键的是，不知道会问些什么样的问题，这令人感到尴尬，因为各班子的成员都坐在下面。”刘孙科用“火药味”形容他所参加过的一次公开述廉的情景。

“听说你用的几个干部都是你的老乡，你作何解释？”作为邵阳市第一批公开述廉的对象，邵阳市委第一副秘书长曾广平一上来就被这样的问题难住了。

类似的尴尬，在 2007 年 11 月 30 日第一次公开述廉中，几乎所有的“一把手”都碰到了。问题各种各样。

“有干部反映你违反规定程序为司机授了警衔，请作出说明。”

“有人反映南门口市场没有进行招投标，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群众反映你经常喊下属打麻将，请你解释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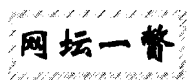
当时在场的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1 月底的邵阳已经非常寒冷，可现场的一些评议对象却直冒热汗。

张亦贤说，“这显然达到了最初预设的目标，搞党政一把手监督本意是教育人、警示人，而不是整人。当时提出两句很形象的话，‘既要让被监督者出一身汗，又不能让被监督者过不了门’。”

保持对“一把手”监督威慑力的另一方面则是案件的查办。“在我担任纪委书记期间，查处了四十来个县处级干部，包括两个县委书记，都判刑了，其中一个县委书记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张

亦贤说。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公民“政策参与”亟待提升

“中国民众的‘政策参与’认知水平远高于实际参与水平，低水平的实际参与对政策参与客观状况总分起了重要的‘拉低’作用。”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合作发布的政治参与蓝皮书暨 2012 年《中国政治参与报告》如此评价当前民众“政策参与”的实际状况。

该报告显示，民众对“权利与参与途径认知”、“政策重要性认知”的得分率均超过 50%，而“实际政策参与”的得分率仅为 11.00%。

在该报告主要执笔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史卫民看来，公民“了解和接受公共政策的参与”水平大大高于公民“实际政策参与”水平这一特点，显示当前中国的公民政策参与，是“接受型的政策参与模式”，而不是“博弈或改变型的政策参与模式”。

“目前公民的政策参与基本停留在‘解决问题’和‘增进政策接受性’的水平上，较难提升到‘增加民众对政策尤其是决策的影响力’的水平。”史卫民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如此表示。

2011 年的《中国政治参与报告》显示，1982 年制定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公布了宪法修改草案，并以 4 个月的时间进行全民讨论。此后，“开门立法”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对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视，使中国民众开始注重立法参与和政策参与。

此后，1995 年至 2003 年中国的政治参与，带有明显的“创新”参与方式的特征：一是在基层选举密集化的态势下，出现了一系列的“选举创新”，为民众的选举参与提供了不同参与机会；二是在群众自治参与、政策参与中创造了一些新的参与平台，如村务公开、城市社区建设和“网络参与”等。

继 2011 年之后，此次《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2)》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第二次发布的中国公民政治参与蓝皮书。

史卫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1 年报告的调查问卷数据并非一手，而是来自已有的国内科研机构和高校的数据。而 2012 年的报告则完全建立在专门的大规模调查基础上。

2011 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合作，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中国公民政策参与”问卷调查，共计回收有效样本 6286 份。

“我们需要通过调查，对中国公众的政策参与给出一个基本的评价，这就需要一套指标。”史卫民介绍说，过去的指标体系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把客观事实和主观意愿混在了一起。而此次调查的一个最大特点是，设计了两套指标体系，一套是政策参与客观状况评估指标，一套是政策参与主观状况评估指标。“把主客观加在一起，是不科学的。主观意愿一定比较高的，客观比较低。国内的很多调查，把主客观混在一起，得分很高，政府满意，但结论不一定科学。”史卫民说。

与 2011 年报告涉及选举参与、政策参与、人民团体和群众自治组织参与、接触式参与等各种政治参与类型不同，2012 年报告的主题更集中，专门就公众的政策参与进行调查并给出评价。

此次报告首次对中国公众政策参与的基本面有了较全面的摸底和评估。问卷调查显示，有 71% 的被调查者同意“即便我不了解政策内容，我也会按政策要求去做”的说法，显示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多数公民可能采用的是愿意配合的态度。

在中国的五级政府中，被调查者选择市级政府制定的政策与自己关系最为密切的人最多，其次是中央政府，第三是乡级政府，第四是省级政府，认为县级政府制定的政策与自己关系最为密切的人最少。

在 2012 年的这份报告中，一个最重要的基本结论是，当前中国民众在政策过程中以“接受政策”为基本特征的参与，可以称之为“接受型的政策参与模式”。

“通过这个基本结论，我们解释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公民政策参与到底是针对什么的？从这个模式来看，我们的政策参与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而不是为了改变政策。”史卫民解释说，一个通俗的理解是，例如医保，公众普遍认为医保政策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各种问题，公众对医保政策的参与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

形成这个特点的原因何在？在史卫民和课题组团队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的顶层制度设计和老百姓的参与有相当大的距离。“当前一些重大政策，都是由中央层面来制定，在这些制度设计和决策方面，公众的参与是非常少的。”

报告认为，这种制度建构的模式，对公民的政策参与，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

优点是政府对于民众了解政策和执行政策提供了保障作用，缺点是把政策参与层级压的很低，真正在决策层面的参与比较少。

课题组研究认为，这种消极影响最主要表现在，缺乏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尤其是影响决策的制度安排，或者已有的制度安排(如政策听证会、政策方案意见征求)实际作用不大。

“例如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制定相关就业、社保、教育等政策时，缺少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史卫民表示。

而日前的各类听证会流于形式也早已广受诟病。一些参加听证的代表可能是事先安排好的，听证后总是绝大多数同意政府的方案。

“听证会走过场，预先设置议题，实际上是为保证政策过关。如果以此为前提，公众参与很大程度上就是个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种思路背后的大背景是，当前各级政府头号任务还是求发展，而百姓更关注民生，两者之间产生了差异，体现在政策上，如果更多引入百姓和社会的参与，发展速度势必会受到影响。

“并不能说当前政府在推动公众政策参与方面动力不足，而是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有让公众参与政策的意识和需要，另一方面，也有担心，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比较纠结。”房宁如此评价。

在此次调查中发现，对某项政策不满意时，被调查者可能采用的表达意见方式，排在前列的分别是“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向政府有关部门(包括信访部门)反映”、“找熟人帮助解决问题”或“向媒体反映”，而“参加听证会反映意见”则排在倒数第二的位置上。

对于这样的现状，课题组得出的结论是：已有的制度安排(如政策听证会、政策方案意见征求)实际作用不大，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而不是弱化了政策过程(尤其是决策过程)的“模糊性”。

史卫民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任何政府在整个政策过程中，都有一个模糊区间，“在中国，由于存在中央和地方的博弈、资源分配的问题以及行政效率等原因，政策有一定模糊性是客观存在的。但有一种模糊性是要消除的，就是利益集团在操纵政策的制定。”

在他看来，模糊性本身可以用公开性的制度设计来减少不良后果，公民政策参与要求的“开放性”，与中国目前政策过程较强的“封闭性”确实有一定的矛盾。

史卫民指出，在政府运作过程中，2003年的非典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决策者如果隐瞒事实，不在关键时候，和媒体、公众、世界达成一致，受惩罚的正是决策者，后面跟着的一定是问责下台。”

而在课题研究团队看来,近年来,政府改变“封闭性”决策过程的努力也在显现。如在医疗体制改革的政策方案选择等方面,就大量采用了“开放性”的做法,经过四年的各界大讨论最终形成了目前的医改方案。问题是,这样的尝试还太少,还难以起到改变中国既有政策模式的决定性作用。

“政策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政府来说,要通过比较形式化的方式,走向比较有实际意义的方式。”史卫民指出,相对完善的政治参与既需要理性的政府,也需要理性的公民,尤其是政府,需要大量的政策学习,“学习什么呢?在决策中不能拍脑袋,在执行过程中不能强行推,在评估过程中要科学,不能想当然。”

课题组成员、中国社科院政治所博士郑建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政策参与的种种不足,一方面是个阶段性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与政府的行政效率考量相关,“政府要预先评估收益和损失,在这个过程中,会找到一个他们认为稳妥的点去推进。”

“制度的建成是个漫长的过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直在推进,尤其这十年发展比较快,已经开始建立相应的制度。”史卫民指出,政策参与制度的形成,和选举制度一样,形成之后,从不规范逐步走向规范,就会对整个社会产生作用,“不过,关键的问题,不在文本的制度,

往往在实际操作。从文本意义上说,每个公民都可以对任何政策发表意见,但问题是,发表了有用吗?这就是机制问题,而不是制度问题。”

以上信息均来自权威报刊和官方网站

刊头题字: 张甫雄 责任编辑: 镇江市图书馆期刊部

地址: 镇江市解放路 17 号

电话: 84447365 邮编: 212001

E-mail: zjtsgbk@126.com